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

谢俊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提 要 鸦片战前, 上海的会馆公所基本上属于封建商业社团性质。鸦片战后, 已初步具有向近代产业社团组织转化的诸多因素。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 其区域性色彩逐渐淡化, 日益发展成为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团体组织, 对抵制外国侵略、促进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 会馆公所的区域性、排他性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社会经济发展, 造成上海众多帮派势力的存在, 成为近代上海阴暗面之一。20年代后, 会馆公所为同业公会所取代, 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关键词 清代 上海会馆公所

清代自进入康熙以后, 由于政局稳定, 社会经济重新走向繁荣, 反映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组织会馆公所相继增多。“走通都, 过大邑, 见夫士商云集, 或游宦, 或服贾, 群然杂处其地者, 罔不设立会馆”。“各直省尽然, 尤莫盛于北之幽燕、南之吴越”。^①上海地处江海要冲, 是吴越的门户, 自元代起就是一个“海舶辐辏”的商港。入清以后, 特别是自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海禁解除, 海运恢复, 商业重新活跃起来。“邑之喧阗, 以大小东门为最, 而货迁俦侣, 亦稠集于兹为多, 各省栈商, 如闽、如粤、鲁、晋等, 皆建设会馆”。^②鸦片战后, 上海开埠通商, 地位日渐替代广州, 成为国内外商贸中心, 会馆公所更是迅速设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 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200年中, 上海共有会馆公所150多个。^③是有清一代, 全国所有城镇中, 设立会馆公所最多的一个。本文就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创办原因、内部组织、特点、作用作一简述。

(一)

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1715年(乾隆五十四年)旅沪青口商人建立的祝其公所。此后, 尤其是鸦片战后, 日渐增多,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上海交通便利, 商业发达。上海濒江带海, 是长江沿岸七省的出海口,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加上与富庶的江浙平原打成一片, 因而成为“九州万物总萃之区”“水陆土产转运中心”, 百货云集, 商业发达。“鸿商善贾, 廉五贪三操计, 然筹策者, 踵接肩摩, 日无虚晷”。^④为了贸易经营上的需要与便利, 各地旅沪商人, 深感有联络的必要。“仕宦商贾之在他乡者, 易散而难聚, 易疏而难亲, 于是立会馆以联络之”。^⑤“组织公所, 研究商情, 为同

来稿日期: 1999年9月15日。

业力谋公益”。^⑥

2. 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上海开埠后，成为西方掠夺我国原料和推销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内地商人纷纷来沪经商。外国的侵略压迫，外商的排斥竞争，加速商人之间的联络与联合，组织会馆公所，力谋抵制。《山东会馆创立碑记》中说：“今者，商务日兴，……上海繁富，蹈重瀛，挟巨资，以谋倾我商业者，不可胜数。奇技淫巧，起徒手至巨万者。皆是也。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轨，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倘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今会馆之成立，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⑦而来自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商人也因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彼此竞争，倾轧，迅速按地区按行业进行组合。同治年间，浙江乍浦的靛业商人来沪，因初来乍到，草创之始，受到上海本地靛商的激烈的竞争和排斥，后来“幸有负才望者出而创立鄞江会馆，设规矩，定章程，方才立住足”，“主宾咸然悦服”。^⑧川沙的土木业与宁波绍兴的在沪木工业因抢夺生意，彼此磨擦有年，甚至双方发生斗殴。最后以各建公所，划定范围，平息了事。南京、苏州在沪玉帮业因争抢地盘，交斗争讼长达七、八年之久，最后也以各建公所、划定范围，相安无事。上海的会馆公所就是在中外商业竞争中，为了“团结同仁，捍御外侮”，抵制外国经济侵略，以及“联络同业之声气，维持同业之信用”，以“独标一帜于商战剧烈之世界”^⑨普遍地建立起来的。

3. 农村破产，来沪谋生者日众。鸦片战后，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沿海沿江地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江浙地区本来地狭民稠，赋重税多，人民生计艰难，此后，失地、缺地农民有增无减，大批劳力被迫离开农村，流向城市。一部分人来到上海，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浙江《四明公所创立碑记》中说：“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除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⑩《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中说：“宣歙多山，率确而有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然而来沪谋生并非易事，“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途萎折，殁无资、殡无所，或无以归葬，暴露于野。盖仁人君子所为而伤心，而况同乡井者乎？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最重，宣歙人尤多”。^⑪同乡、同仁有见于此，乃“共切桑梓之谊，创立一会，专为本籍同业中之贫苦者给棺柩，死亡者施赈恤，安魂妥魄起见”。^⑫为了赈恤旅沪贫病孤苦的同乡，于是起而组织地区性的会馆公所。

4. 上海会馆公所创立最多的是在同光年间，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关。1860年后，太平军经略东南。江浙两省大部地区落入太平军手中。各地地主、官僚、商人，其中也不乏农民、手工业者纷纷来沪，侨居避难。《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记中说：“当是时，都（指江南各城镇）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器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老死者至不得殓厝处。它族或购屋作殡房者，又靳不相假；乡之人仿为之者，辄苦集资不充，才买地数畝而已”。同邑人士颠沛流离、落难沪滨的凄惨情景引起同乡有力者的无限同情，于是起而组织江宁七邑公所，集资购地，施棺掩埋，或运柩返乡安葬。又如同治初年，苏州失陷后，洞庭山各商因避难来沪者日增，以“固有之惠安、固仁、体仁三堂合并，公建莫罄三善堂，为同乡会聚之所，寄棺之处”。镇江旅沪流民，在兵燹之后，每遇疾病，死亡暴露，也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建立了京江公所。

5. 保固身家，援救陷阱同乡。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强行建立租界，流氓歹徒，匪盗充斥，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杀人越货，时有所闻；绑票勒索，日以复加。处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各地旅沪人士，无论为商为贾，还是为工，始终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惟恐遭到不测，于是主张团结乡里，“团结自保”。《四明公所长生同仁会创立记》说：

“长生同仁会之设立，意在保固身家”。^⑭“一人罹难，合会伸援”。《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碑》中指出：“倘有被痞棍欺诈情事，关碍大局者，务宜推诚助理，毋相观望。应需使费洋钱，同业公帖一半”。^⑮《潮惠公所创立记》中也说：“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坐，动成疮痍。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井，亦能代表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明神，盟之息壤”。^⑯

(二)

会馆与公所，同为民间商业社会的团体组织。“名虽异而义则不甚相悬”。^⑰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说来，会馆主要按地区组织，或以省际，如山东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或以埠际，一邑数邑不等，如潮惠会馆、泉章会馆、常州八邑会馆，等等。按行业组织的会馆则比较少，上海商会会馆、钱业会馆、茶叶会馆、木业会馆等均属例外，这些会馆虽以行业名之，实则仍由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商人创立。如茶叶会馆就是由福建在沪茶商组织的。商会、钱业、木商等会馆的组织也类皆如此。公所的组织形式，地区与行业并重。如四明公所，京江公所，浙绍公所，水木业公所，鲜果公所，鸟木公所，典业公所，等等。此外，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的会馆公所名称，不用“会馆”“公所”，而是以某某堂、某某殿、某某会名之。如油豆饼业公所称神尺堂，徽宁会馆称徽宁思恭堂，洋货业公所称振华堂，药业公所称和义堂，洋广衣业公所称轩辕殿，水木工业公所称鲁班殿，四明竹业公所称同新会，四明内河小轮业公所称永安会，等等。这些堂、殿、会，名目虽异，实际上就是会馆公所。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开办均有严格的程序和步骤。

1. 发议。属于地区性的会馆公所，大多由“从宦于兹土者”，即旅沪仕宦商贾“董其役”。如建汀会馆就是由当时任上海知县的建平人林谦普提议创立的。江西会馆是由上海知县、江西人虞南曾一手创办的。山东会馆是由上海道、山东历城人汪瑶庭与旅沪鲁商“谋立”的。常州八邑会馆则是由寓居上海的大官僚大买办、武进人盛宣怀独资捐建创办的。属于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则多数由同业中资历厚实、信用较著的店主或“诚实可靠”“心地光明”的“号东”、“伙友”发起，集体捐资建立的，如鲜肉业公所就是由南市香雪堂肉店店主为首，发议创立的。

2. 集资。会馆公所创办的经费多数由公共集资，或由同人捐助、同业摊派，或按货抽厘。少数是“殷者效财，能者效力”，由几个资本家出资筹建的。如台州公所就是由民族资本家朱佩珍等领头捐资创办的。为了表示自己的“德政”和与各方人士联络，上海知县也常常捐款支持各类会馆公所的创办。四明公所中秋会创立时，上海知县、主簿均捐款数千千文，即是一例。

3. 创办。会馆公所都设有日常办事活动机构—议事厅（又称议事所、会议所），此外还设有正殿（又称正堂）、祠堂。正殿，置放上海道、上海县批准馆、所创立的勒石碑刻。正殿只有在全体成员集会，或逢年节喜庆举行宴会、演剧时才开放。祠堂供奉本馆（所）崇拜的神佛，是祭礼活动场所。

4. 推举董事。会馆公所日常事务“悉归号商经理”。^⑱经理有称司年、值年、轮年的，如典业公所。有称司月，值月的，如钱业、木工业会馆公所等。司年、司月等均由同业各店号按年按月当值。也有称柱首的，宁绍长生会分元、亨、利、贞四柱，浙绍公所分设福、

禄、寿、禧四柱，每柱设柱首2名，按年轮值。更有称总柱、分柱、董事的，如宁郡六邑竹业同新会。有称经董的，按地区推派代表，实行共管，如泉漳会馆设经董5名，其中同安县2名，海澄县1名，龙溪县2名。所有这些司年、司月、柱首、经董、董事不是由“位尊望重”的“公正绅董”担任，就是由同业中有资力的店主、号东“主持”，少数由同业中“诚实可靠会友为之”。司年、司月、柱首、经董、董事并非专职，“各有生意，并非专意在此而取薪俸者”。^⑩多数会馆公所还设有1—2名丁友。照看馆（所），兼任日常卫生、安全、联络等事务。少数会馆公所还设有会计，负责馆（所）的财务。

5. 制定章程。多数会馆公所立有章程。章程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 日常银钱出入保管办法；2. 生意经营，包括统一价目、收徒等；3. 官府捐款、公共项目经费的摊派等；4. 馆所所置房产、土地、租田、塚地的管理使用；5. 宗教祭祀活动；6. 司年、司月、柱首、经董的权限职守；7. 排解内部纠纷及有关案件诉讼；8. 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其他条规。会馆公所的章程须“勒石厅堂间壁”，或“命工折印分送各同乡”。^⑪

6. 呈准官府立案批准。会馆公所若得不到官府批准，不能开设。因此，在正式成立之前，必须先要呈文上海道或上海县，详述会馆公所开办缘由及其宗旨、创始人的姓名，最后由上海道或上海县出面勒石，宣示全城“不准游棍阻挠滋事”“永为保护”。多数会馆公所还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得房产、塚地免征课税的特权。

7. 正式成立。会馆公所的成立，热烈而又隆重。全体成员，包括家属在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参加庆典活动。庆典活动一般为1—3天，视会馆公所的性质、大小、经费多寡而定。活动内容有敬神祭祖，祈求日后“万事如意”“生意大吉”；宴请地方权贵显要及其他会馆公所负责人，“以壮声威”“藉资联络”；成员聚首会餐，敦睦乡谊；演剧招待社会。

会馆公所成立后，便开始正常的馆务活动。

(三)

根据对清代上海150多个会馆公所碑刻文字记载及有关文字资料分析，清代上海会馆公所活动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大多设立在上海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区，即县城大小东门内外和十六铺一带。

2. 平日除遇有特殊情况随时集议外，其日常活动时间一般是固定的，或一星期，或十天、半月，乃至一月不等。每年两度的“春秋祭祀”和“中元设醮”“岁时祭享的活动时间则是绝对固定不变的。

3. 经济公开，平日议事多取民主协商办法。遇有重大事件，由司年、司月、柱首、经董等出面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公议解决办法。如果意见分歧，不能统一，最后用抽签办法解决。

4. 供奉神佑。供奉的具体神祇因地区、行业不同而异。山东会馆供奉孔子牌位；江西会馆供奉福主旌阳许真君、五路财神、文昌帝君；商会会馆供奉关帝、火德星君、增福财神。有些会馆公所崇奉中华始祖先圣，如药业公所奉祀炎帝、神农氏；纸业公所奉祀蔡伦；木业公所奉祀公输子和鲁班；农业公所认为轩辕“隆泽斯土，治贤垂裳，作整衣带，是以兴吾业”，因而奉祀轩辕。钱业公所供奉已故先董牌位；四明公所冬至会、长生孟兰盆会供奉祖父母、父母长生牌位。更有趣的是，靴鞋业公所供奉履主、孙臬、赵武灵王。工艺公所则供奉圣母玛利亚。不过总的说来，会馆公所供奉最多的是关帝、天后、圣母、观音、土地神。会馆公所定期举行祭祀活动，“日则诵经礼忏，夜则设放瑜加焰口”。会馆公所供奉神

佑，举行祭礼，为的是托庇神灵，“俾得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④“得福去祸”“消免灾晦”“生意和顺”，“为同人祝平安”，“协恭共济”。^⑤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的背后，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商人、手工业者长年在外谋生的艰辛，无力战胜各种灾难，只好乞求神灵保佑。也反映了他们久客不归、思乡恋亲的心情。

5. 设有义塚、殡舍。“义塚之设，以妥旅魂”，^⑥专为掩埋无力运回家乡安葬的棺骨。殡舍“以寄放棺槨”，多称之为善堂。如靛业公所殡舍称留照堂，浙绍公所殡舍称永锡堂，建汀会馆殡舍称同庆堂、集义堂。规模比较大的会馆公所，如四明公所还附设殓棺局，专门出售棺槨。

6. 设有“公棧”“丙舍”，为“各绅商登岸驻局之所”。^⑦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来沪宣传变法，就曾寓居上海的南海会馆。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其成员来沪大多藉宁绍会馆为驻所，开展活动。黄遵宪来沪也曾下榻潮惠会馆。类似的例子很多。有时公棧、丙舍也作“屯货”之用。^⑧

7. “置产收租”和“赁屋收费”，用作会馆公所日常活动开支。

8. 凡属同乡、同业来往人员均可借住会馆、公所，因此，会馆公所日常“士商云集，或游宦，或服贾，群然杂处”。^⑨

9. 区域观念极重。非藉莫属，非业莫属。凡非本乡本业（即便是同业，未入会馆公所者）一概排斥在外。建汀会馆龙岗会章程中关于塚地规定：“他帮人棺木概不得进厝埋塚”，“倘有朦混，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反之，凡属同乡、入会同业者，均可享受本会规定的好处。宁绍木业公所章程明确规定，凡是本所成员，因生计一时无着，本所可为之介绍生意，提供诸种方便。

10. 有些行业，如钱业、书报业、药业、木工业、鏊业、典业，因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这类会馆公所往往还附设有专门的补习所，艺徒夜校，由本会馆（公所）内年长技师教授生徒。少数会馆公所为了解决和便利本会馆（公所）成员子弟的读书问题，还延聘教师，开设普通学校，常州八邑会馆附属学堂就属于这种性质。

11. 设有恤嫠会、慈善会，赈恤业中孤苦嫠妇，，“留养同业病人”，成员因公身故，则施以棺木，给予殓费。条件好的会馆公所还设有医院、养病房、息影所（属疗养性质）。如广肇公所、药业公所、金银实业公所就是如此。少数会馆（公所）还设有疗养所，同业职工退休后还可以领取退休金，钱业公所就是一例。

12. 所有成员必须自觉遵守会馆、公所章程，违章不遵，当众除名；违法犯罪，永远逐出。此外，成员有义务有责任为本会馆本公所保守秘密，通报信息。

(四)

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作为封建社会的民间商业社团曾为推进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上海与各地的联系，维护各地在沪各行业之间的合作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具体地说：

1. 强固商力，为同业谋利益。有了会馆公所，各地各业在沪商民有了“议事之所”，“且取集思广益之议，可谓得商务之要领”。^⑩“生合群之力，而联络散涣之情”，“交谊深，而商情自固”，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2. “俾消衅隙，共济时限”，“排解纠纷，端赖是会”。“既同井邑，宜援陷井。成员一旦出事，或内部发生矛盾冲突；或遭歹人暗算、上当受骗、欺压情势，可藉会馆公所、同邑、

同业之力协助排解和“代为捍卫”。

3. 敦睦梓好，克修乡谊。会馆公所“为同乡汇叙之所”和娱乐中心，“俾春秋佳日，宴集谈心，不时聚首。虽处异乡，情同故里”。“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与乐其乐也”。^⑦

4. 恤贫救困，赈济乡里。同邑同业中，或年迈体弱不能力作；或壮年生病，难以为生；或子女幼小，难以养家糊口者，往往“给资赡养，俾使冻馁无虞，幼稚者生成有望”。同乡客死沪上，无亲友办理善后者，准地方报明会馆公所，给棺掩埋。此外，若家乡发生灾荒，会馆公所还集资赈助乡里。1833年（道光十三年）江苏青口一带水灾，祝其公所提公所公积金四千千文助赈。1884年（光绪十年）山东旱灾，山东会馆、洋布公所捐赈银数百两。^⑧

5. 捍御外侮，维护民族权益。“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今之公所，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⑨1874年（同治十三年）法租界开拓马路，侵占四明公所塚地。四明公所同乡会员数千人“集众抵抗”，后虽经官方迭次交涉，迄无结果。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法租界再次扩充马路，企图强占四明公所塚地，激起浙江宁波、绍兴等地旅沪商民“大愤”。在民族资本家、台州会馆负责人严信厚以及叶澄忠、沈敦和、沈洪赉的组织领导下，“南北市相约罢工”。清政府惟恐“再酿巨案”，急令两江总督刘坤一遣员蒞沪查办。迫于中国人民的压力，法国侵略者被迫作出让步，于是“明定界址，重造围墙，永久遵守”。四明公所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⑩甲午战后，由于外侮日浸，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救亡运动空前高涨，民族资产阶级为挽回利权，开展实业救国运动。1909年（宣统元年），上海的绪论、钱江、云锦、盛泾各庄号与京缎、缫业、典业、衣帽业、绣业各公所团体联合组成商品陈列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展销本公所的产品，对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起了有益的作用。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除了上述积极作用外，还有它保守落后的一面。会馆公所的成员大多是同业兼同乡，多为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部分为商人。他们基本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会馆公所直接操纵在旅沪“有势力者”手里，即旅沪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贾手里。会馆公所成员在接受会馆公所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会馆公所的控制。此外，会馆公所的地区性、排他性，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上海众多帮派的形成和存在，既不利于商业的进一步活跃，也不利劳工运动的健康发展。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有不少史书将会馆公所同封建的行会组织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行会组织较多地存在于手工工场、手工作坊内部。会馆公所同行会组织有联系，行会在相当程序上利用了会馆公所，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但它却不是行会这一类组织。也不象某些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它的存在和封建政权一样，对于手工业发展起着束缚、延缓作用”。^⑪会馆公所虽有一定程度的封建落后性，但对于促进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加强民族工商业者的团结、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等等，这些积极进步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在鸦片战前，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封建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那时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少数仕宦绅商手里。鸦片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上海会馆公所的区域性色彩逐渐减退，按行业按系统联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到清末，这些会馆公所大多演变为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团体，其领导权也大多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手中，并在民族资产阶级组织的商会统一领导之下。1911

（下转第48页）

果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减轻清政府财政负担,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乃至促进清政府的军事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社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裁军作为军事改革的一个环节,同样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他各种相关条件来作保障,当时的清政府却缺乏这些条件,再加上裁军的着眼点在节饷、裁冗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构改革,也是一个应当吸取的教训。

(责任编辑 孔祥骅)

①《筹办夷务始末》卷25,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卷第844页。

②《李文忠公全集》《明愆函稿》卷5,《朋僚奏稿》卷14第49-5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3第33页。

④⑤⑥⑦⑧ 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195、126、207-208、208、174-175页。

⑨转引自杨国强《百年嬗变》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59页。

⑩⑪⑫转引自罗尔纲《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第5、71、72页。

⑬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0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清史稿》第3930、3935、3902、3936、3902、3937、3902、3931、3930、3931、3937页。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229-311、98、362、75-76、98、98-99、99、100、88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9、9637、9507、9636、9636、9505页。

①②王其坤《中国军事经济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版第438-439页。

①③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第137页、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1页。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光绪政要》第1223、172、173、652-654页。

②①《刘忠诚公遗集》卷5第33页。

②②《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第14页。

②③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6、279页。

②④②③《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381、2006、1318页。

②⑤②③②③ 王尔敏《淮军志》第362、284、270、272、275页。

②⑥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6页。

②⑦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6,转引自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85页。

②⑧②⑨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4-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1、14页。

②⑩王闿运《湘军志》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6页。

②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8页。

(上接第41页)

年武昌起来爆发,辛亥革命发生。由这些会馆公所成员为骨干队伍组织起来的武装商团曾参加光复上海的战斗,为推翻帝制、建造民主共和作出了应有贡献。

20年代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工人阶级日益觉悟,以乡土情义维系的会馆公所日趋衰落,并为同业公会所替代。到1934年,上海同业公会约有214个。其间虽仍有会馆、公所的名目见存,但只是公会内部按籍贯表现出来的同乡关系的反映而已。它们从社会舞台上消失,是历史的必然。

(责任编辑 孔祥骅)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333、235、196、371、413、259、232、385、268、411、331、196、269、274、235、417、277、425、336、398、331、322页。

③此数据主要从《上海县续志》、《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县志》、《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等书的资料统计而来。

①《上海县续志》卷三,第8页。

①②同①,卷三,第1页。

②③《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县志》卷六,商务下,第1页。

③《民国七年上海县续志》卷三,第4页。

④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人民出版社,第398页。